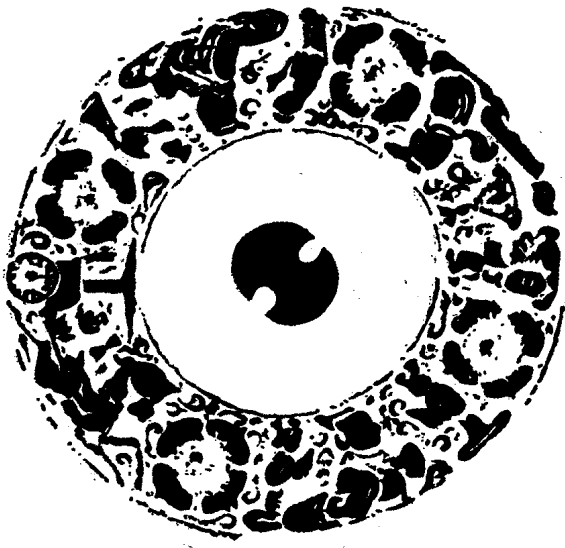


德

第一輯

歷代名醫論德





历代名医论医德

周一谋 编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历代名医论医德

周一谋 编著

责任编辑：朱 杰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3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75 字数：220,000

印数：1——7,200

统一书号：14204·83 定价：1.25元

编写说明

一、为了继承发扬古代医家之优秀医德,加强医疗道德教育,特编写此书,权作医德教育之参考教材,以便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服务。

二、本书共选历代有关医德之论述七十四篇,其内容包括医德专论、医家传记、医书序文、医案、医话等。其中“先秦经典著作节选”虽非医德论文,却有益于医德的培养,故予以选录。首以绪论通贯全书内容,分条论述古代医家之优秀医德,庶其提纲挈领,纲举目张。

三、鉴于文字古奥,义理艰深,故每篇选文均加提要、注释,有的还加了按语,务使义理彰明,便于读者披阅领悟。“提要”说明文章出处、宗旨及其在医德教育方面的重要意义;“注释”则对难懂的字、词、句加以注音释义,甚或的予以语译串讲;“按语”只在若干名家选文中酌情运用,以补充提要之所略,或指明其特殊意义。

四、古代有关医德之论述很多,这里仅选录了其中的一部分,不免挂一漏万,以偏概全,俟日后得闲,再作补充或续编。

五、为了保持原文内容的完整性,一律按历史顺序予以编排,而不采用分类节录的形式。这样,除了可作医德教育的参考教材外,还可帮助读者了解医史知识,提高医古文阅读水平。

目 录

绪论·····	(1)
先秦经典著作节录·····	(26)
《内经》七则·····	(33)
《难经》三则·····	(38)
三书论扁鹊·····	司马迁等(40)
仓公传节录·····	司马迁(49)
苏耽传·····	《列仙传》(61)
郭玉传·····	范 晔(63)
伤寒论自序·····	张仲景(65)
华佗传·····	范 晔(71)
董奉传节录·····	《神仙传》(78)
皇甫谧传节录·····	《晋书》(80)
肘后备急方序·····	葛 洪(87)
论医·····	杨 泉(89)
备急千金要方序·····	孙思邈(91)
大医习业·····	孙思邈(96)
大医精诚·····	孙思邈(98)
梁新与赵鄂·····	孙光宪(103)
钱乙传·····	刘 跂(105)
庞安时传·····	《宋史》(113)
书证类本草后·····	宇文虚中(116)
妇人大全良方自序·····	陈自明(118)
外科精要自序·····	陈自明(121)
医不贪色·····	张 杲(125)

治痰嗽·····	张 杲(126)
医工论·····	《小儿卫生总微论方》(128)
洗冤集录序·····	宋 慈(130)
检验总论节录·····	宋 慈(133)
腰胯痛·····	张从正(138)
李杲传·····	李 濂(141)
曾世荣·····	《衡州府志》(147)
活幼心书序·····	罗宗之(148)
世医得效方自序·····	危亦林(150)
丹溪翁传节录·····	戴 良(153)
丹溪先生墓志铭节录·····	宋 濂(160)
活人为心,不记宿怨·····	万 全(167)
周察小儿病两例·····	万 全(171)
严乐善·····	《嘉兴府志》(172)
解围元藪自序·····	沈之问(174)
李时珍传·····	顾景星(177)
本草纲目序·····	王世贞(186)
本草纲目六则·····	李时珍(191)
针灸大成医案二则·····	杨继洲(201)
儒医·····	徐春甫(203)
庸医速报·····	徐春甫(205)
医箴二则·····	龚 信(208)
医家与病家之要·····	龚廷贤(209)
医家病家通病·····	龚廷贤(212)
证治准绳自序·····	王肯堂(214)
习医规格节录·····	李 梴(219)
医家五戒十要·····	陈实功(223)
祝医四则·····	缪希雍(228)
论治篇·····	张介宾(231)
不失人情论·····	李中梓(234)

李台春	《宝庆府志》(238)
温疫论原序	吴有性(240)
巫卜之鉴	吴有性(243)
明问病之法	喻昌(246)
叶桂传	《清史稿》(249)
临证指南医案华序	华岫云(252)
临证指南医案嵇序	嵇璜(257)
外科证治全生集自序	王维德(259)
沈氏尊生书自序	沈金鳌(262)
人参论	徐大椿(265)
名医不可为论	徐大椿(268)
医学心悟自序	程国彭(270)
串雅序	赵学敏(273)
温病条辨自序	吴塘(278)
冷庐医话一则	陆以湉(282)
医林改错脏腑记叙节录	王清任(283)
验方新编序	鲍相璈(287)
张朝魁传	《清史稿》(289)
明医、草医与大医	周学霆(290)
书方宜人共识说	顾铭照(296)
医门补要自序	赵谦(297)
后记	(301)

绪 论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素称礼义之邦。自商周以来，在许多古代文化典籍中，就充满了道德礼义的宣传。有关惩恶劝善、激浊扬清、褒贬是非的内容，在先秦的文献中比比皆是。《周易》一开始就提出“进德修业”，“自强不息”，认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就曾写道：“相鼠有皮，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邶风·相鼠》）这是人民群众以民歌的形式，对粗鄙野蛮、放纵无礼之徒的严厉谴责。《论语》强调人的视听言行都要用礼来约束。《礼记·礼运》更提出了非常讲究文明礼貌的大同世界的理想。这是对原始公社的一种理想化的描写，也可以说是古人的一种政治理想。其中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里所描绘的大同世界是天下为公、任人唯贤的，人们互相信赖，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不仅尊敬自己的父母，也同样尊敬人家的父母；不仅爱护自己的子女，也同样爱护人家的子女。使老年人能乐享天年，青壮年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少年儿童能够健壮地成长，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者，能够得到社会的供养，疾病和残废人员，能够得到社会的照顾和治疗。男女有别，各司其职。只怕货物被糟蹋和浪费，不必私藏于己；只怕自身为社会效力不够，不必考虑个人的私利。因此，搞阴谋诡计，违法乱纪，偷扒抢骗之类的事，几乎完全绝迹，社会秩序十分安定，人们夜晚可以不关大门睡觉。

这种大同世界的理想，在封建社会里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却也曾鼓舞着历代许多仁人志士，为着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奋斗。

中国医药学，是中国古代优秀科学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我国医学从一开始，就接受了上述古代精神文明的影响。比如惩恶劝善，褒功贬过，同情人民疾苦，以扶危济困为己任，哀孤恤寡，尊老爱幼，待人以诚，彬彬有礼等，这些传统的文明道德，常常在古代医家的言行和著作中得到反映。例如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写的《大医精诚》，就是一篇集古代文明道德之大成的优秀医德论文。他就医生的思想品德，专业学习，对待病人的态度，如何处理同行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刻、精辟的论述。我国的传统医德，比西欧各国尤为突出，其内容更丰富、更深刻、更全面。被誉为西方“医学之父”的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前377年），曾经写过一篇《誓言》，可说是一篇医德专论，后来收录在《希波克拉底全集》里。《誓言》中写道：“凡授我艺者敬之如父母，作为终身同业伴侣，彼有急需我接济之。视彼儿女，犹我兄弟，如欲受业，当免费并无条件传授之。”“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结束一切堕落及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并不作该项之指导，虽有人请求亦必不与之。”“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作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尤不作诱奸之事。凡我所见所闻，无论有无业务关系，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愿保守秘密。”（见李涛《医学史纲》289页，1940年北京：中华医学会编辑部出版）这个《誓言》，各国的医学界都奉为信条，被作为西方医学的道德标准沿用了两千多年，至今还有其不可磨灭的影响。然而在我国，类似希波克拉底氏的论述实在多得无法称引，而且内容广泛深刻得多。一部中国医学发展史昭示我们，在中国古代，几乎没有一位名医、没有一个医学家不重视医德修养的，这是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当加以珍惜，努力予以继承和发扬。

古代医德可以继承吗？回答是肯定的。即使是一般的传统道

德，尽管带有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但其中也有许多优秀的东西值得继承。至于医德，情况更不相同了，它是一种职业道德，其根本出发点是忠于医生的职守，竭诚尽智地为救治病人效力。虽然也受时代和阶级的影响，但比较起来，它的人民性更为突出。对于传统医德，不仅应当加以继承，而且必须努力予以发扬。大家知道，社会主义医疗道德的基本原则就是：忠诚于人民的健康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可以说是对人民群众极端热忱，极端负责，对医疗技术精益求精。这些原则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我们今天的优秀医德，正是在继承前人精神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我国古代对医德有很严格的要求，早在西周时期，对医生就有全面考核的制度。据《周礼·天官》记载：我国医学在西周时即已出现分科，分为食医（营养医生）、疾医（内科医生）、疡医（外科医生）及兽医四科。不论哪一科，每到年终都要进稽考。“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毫无疑问，这里的年终考核，不单纯是技术考核，还包括着医生的思想、品德、作风、态度等方面的内容。一个思想品德很差的医生，就不可能获得“十全为上”的成绩。《素问·征四失论》说得很清楚：“所以不十全者，精神不专，志意不理，外内相失，故时疑殆。”这就是说，医疗差错的产生，除了和技术水平的高低有关之外，还决定于“精神不专，志意不理”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态度，其实质也就是医德问题。因此，古代医家在论述医疗技术时，几乎都要论及医德修养。本书辑选了历代名医论述医德的文章七十余篇，选材范围包括历代文献中的医德论专、医家传记、医书序文、医案、医话及某些地方志中有关医家医德的记载。为了保存各篇的完整性，一般力求选编全文，篇幅过长的则只作节录。对于不宜选编的文献，则只作语录摘抄。一律按历史顺序加以编排，以窥其承前启后的相互关系。因文字古奥，义理艰深，不易阅读理解，故每篇均作了提要 and 注释，极少数篇章还加了按语。这些文章集中反映了古代名医的优秀医德。

其主要内容，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热爱事业 勤学苦练

《论语·雍也》说得好，“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段话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勉强学习的人，不如爱好学习的人；而爱好学习的人，又比不上以学习为乐趣的人。当医生的尤其是这样，只有无比热爱自己的专业，并以从事医学专业为乐时，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聪明才智，也才有可能真正做出成绩来。晋代杨泉（一作梁代阳泉）在《物理论》中说：“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医，必选名姓之后，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贯幽达微，不失细小，如此乃谓良医。”这就是说，医学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学好的，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医生的。因此，古人对医科学生的挑选十分严格，必须品德高尚，热爱医学专业，加上聪明好学，才有可能获选。《素问·金匱真言论》明确提出：“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不是适合于学医的对象，绝对不教；不是准确无误的医学知识，也绝不传授。长桑君收扁鹊为徒，乃是经过“出入十余年”的观察了解，知道“扁鹊非常人”，才把全部秘方书传授给他。公乘阳庆为西汉医学高手，他因家资殷富，从不轻易给人看病，更不受授学徒，就连子孙也不教。当他看到淳于意十分酷爱医学，而对待老师又很恭谨时，便破例地收了这个学生。并且很高兴地说：“我家给富，心爱公，欲尽以我禁方书悉教公。”元代名医朱震亨三十岁时始攻《素问》，四十多岁时游学各地，遍访名师。当他得知在武林（杭州）修道的罗知悌擅长医学时，便毫不犹豫地前往拜师。罗知悌是金代名医刘完素的再传弟子，旁通张从正、李杲的学说，颇负盛名，但为人很傲慢。朱震亨前后往返十次，罗氏竟不接见。朱震亨求师心切，并不因此而灰心，恰恰相反，他“志益坚，日拱立于其门，大风雨不易”。（宋濂：《丹溪先生墓志铭》）此种精神，使罗知悌

深受感动，于是整理衣冠出来接见。交谈甚欢，有如故旧，只恨相见之晚。罗知悌尤喜朱氏之精诚好学，便倾囊倒箱，和盘托出，将全部医术传授给他。

东汉医学家张仲景，年青时曾跟从张伯祖学医，由于刻苦钻研，勤学苦练，后来医术“精于伯祖”，竟是青出于蓝。他对医学的高度热爱和重视，已在《伤寒论自序》中款款输诚。他批评当时的士大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只知道“竞还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指斥他们是蒙蒙昧昧的“游魂”。张氏处在战祸绵延，疫病猖獗流行的东汉末年，到处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象。张氏家族原为南阳郡的世家大族，一向有两百多口人（也有认为是两百多户的）。可是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来不到十年的时间，竟有三分之二的人罹病死去，其中死于外感发热之伤寒病症的占了十分之七。严酷的现实迫使他更加重视医学的研究，于是悉心钻研《素问》、《九卷》（即《灵枢》）、《八十一难》（即《难经》）等古典医学名著，结合自己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终于写出了《伤寒杂病论》这部不朽的名著。现存的《伤寒论》和《金匱要略》两书，实质上就是由此书一分为二的。张氏不仅有功当世，而且泽及后世子孙，后人因而立祠纪念他。不仅在他的家乡南阳一带建有医圣祠，外地亦有纪念性建筑。据《长沙县志》记载，长沙原有一所张公祠，“建在湘城中贤良祠之西，祀汉太守张机，字仲景。汉时长沙大疫流行，治法杂出，公为作《伤寒论》、《金匱方》行世，全活无数。祭法曰：有功德于民者则祀之，此之谓也。”由于张氏的研究成果能为子孙后代造福，所以人们纪念他。

唐代名医孙思邈，由于“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因而深感医学之重要。毕生嗜医成癖，竭力攻读医学，直到“白首之年，未尝释卷。”明代伟大医药学家李时珍，世医家庭出身，精心于医药学的研究。他看到历代本草谬误颇多，感到忧心如焚，认为事关人命，不可等闲视之。因而搜罗百氏，采访四方，“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用毕生的心血和精力，编撰

了《本草纲目》这部驰名中外的医药学巨著。由此可知，不论古今中外，凡是卓有成就的医药学家，没有一个是热爱本专业的，也没有一个不乐意为医药事业献身的。如果朝秦暮楚，见异思迁，没有牢固的专业思想，是任何成绩也做不出来的。

“至道在微，变化难极”，（《素问·灵兰秘典论》）“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张仲景：《伤寒论自序》）医学的道理很艰深，疾病的发展千变万化，若非多闻博识，勤学苦练，又怎么能掌握它呢？很难设想，一个坐井观天，孤陋寡闻的人能够精通医学。究竟医生应当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对于这个问题，历代医家，多有论述。《素问·著至教论》提出：一个好的医生“必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又说：“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东汉医家华佗之所以在医学上造诣很高，与他“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是分不开的。张仲景强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认为自己绝非生而知之者，必须通过后来的刻苦学习来掌握方术。晋代针灸学家皇甫谧，家贫好学，常常“带经而农”，一边生产，一边读书，文、史、哲、医各方面的书籍都读。直到中年得了风痹症，处于偏瘫状态，仍然“耽玩典籍，忘寝与食，时人谓之书淫”。（《晋书·皇甫谧传》）州郡的藏书，他几乎读遍了，竟至直接写信向晋武帝借书，晋武帝便赠送了他一车书。其嗜书成癖，亦可见一斑了。晋代医家葛洪家贫，常“饥寒困瘁，躬执耕耨”，自恨“农隙之暇无所读”，便千方百计借书。“乃负笈徒步行借，又卒于一家，少得全部之书。益破功日伐薪卖之，以给纸笔”。（《抱朴子外篇·自叙》）他背着书箱，到处借书，很难在某一人家借到所需之书。于是起早贪黑，上山砍柴变卖，换来纸笔抄书。劳动时，还经常用树枝在田头地边练字，“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人鲜能读也”。由于缺乏纸张，常常在每张纸的正面和反面都写上字，致使别人很少能看清。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博涉群籍，“但贪广览，于众书乃无不暗诵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杂文章，近万卷”。后来他在医药学和其他学术上，都有很高的造诣，与他

勤学苦读是分不开的。

孙思邈主张医生博览群书，认为医学、史学、哲学、文学、天文、地理等，都要阅读，才能于医道无所滞碍。否则如“无日夜游，动致颠殒”。（《千金要方·大医习业》）李时珍更是一位博学多才而又刻苦钻研的典型。他曾向王世贞作自我介绍说：“长耽典籍，若啖蔗饴，遂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本草纲目·序》）他以学习作为生活中的最大乐趣，读书就象吃甘蔗饴糖一般。他广为涉猎，除了医书之外，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音韵学、农学、天文、历法，乃至诗歌小说，无不披阅浏览，只要遇上有关医药学的内容，就立即加以摘录笔记。这就为他后来编书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明代医家徐春甫说：“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细。”（《古今医统·庸医连报》）南齐褚澄说：“病有微而杀人，势有重而易治，精微区别，天下之良工哉！”（《褚氏遗书·审微》）他们的话是很对的，一个医生必须技术专精，否则就会贻误人命。技术低劣的医生，可以把轻病患者治死，而技艺高超的医生却能化险为夷，使垂危病人得救。《难经·十三难》指出：“阳绝补阴，阴绝补阳，是谓实实虚虚，损不足，益有余，如此死者，医杀之耳。”因此，当医生的绝不能浅尝辄止，“不得道听涂说，而言医道已了”，甚至略略记下几个处方，就以为“天下无病可治”，那样只能误己害人。医学知识的精与博是辩证的统一，没有博就不可能精，而只博不精也不能解决问题。要学好专科，首先必须学好基础知识，要攻外科，必须先学内科。明代医家李梴说得好：“如欲专小科，则亦不可不读太科；欲专外科，亦不可不读内科。盖因此识彼有之，未有通于彼而塞于此者。”（《医学入门·习医规格》）知识就好像连通器，是彼此渗透，相互补充的。古代许多医学名家，常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各科兼通，如扁鹊、华佗、孙思邈等，无一不是如此。

要使医术专精，必须安贫乐道，不慕荣利。古代许多名家拒

绝荐拔做官，毕生行医于民间，其道理也就在这里。如果“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那是根本不可能精通医学的。据《历代名医蒙求》和《古今医统》等书记载：北宋时期，有个进士叫沈常，因性格孤僻高傲，曾求仕多年，未能弄到一官半职。但他并不死心，便赴京师（开封）寻求仕进的门道。一天，他在东华门遇见一位“跃马扬鞭，从者雄盛”的翰林医官，便叹息不已地说：“吾穷孔圣之道，焉得不及甘草、大黄辈也？”因而产生了弃儒习医的念头。第二天，他从一个药店经过，听人说起业医的艰难困苦，“复又耻为，疑贰不决”。他自视清高，认为学医是大材小用，低身俯就。他跟别人议论说：“吾辈学则穷达方书，师必趋事名公，自非常流比也。”认为以他的满腹经纶去学医，有如探囊取物，只须参拜一位名师，稍得指点，即可蜚声医坛。当时有位太医，名叫赵从古，在医界颇有声望，沈常便决计去拜访他。乍一见面，沈常说：“此来穷蹇之人，因同人相勉，令某学医，闻君名公也，故来师问。”赵从古一针见血地指出：“足下既言穷蹇，是志未遂，复却学医，深恐郁滞之性，未能精研。”沈常见赵存古批评他功名利禄之心仍切，不可能专心致志攻读医学，颇不以为然，便愠怒不已地说：“吾虽穷蹇，乃自服儒，读孔孟之书，粗识历代君臣治国之道，今徒志学技术，岂为高艺？”赵从古驳斥说：“恐非浅尝能也，君未谕上古三皇医教……吾闻儒知礼义，医知损益。礼义之不修，昧孔孟之教，损益之不分，害生民之命。儒与医岂可轻哉！儒与医岂可分哉！”古代强调先通儒理，后通医理，也就是说，先要打好文化基础，然后才能攻读医书，这自然是很有道理的。沈常中了进士，无疑已通儒理，学医很有文化基础；如果他真的重视和热爱医学，并且下定决心钻研，是完全能够学好的。无奈他求仕之心仍切，时时在宦途与医学之间较短量长，比高论低，总希望有当一日，否去泰来，官运亨通。因而徘徊不定，首鼠两端，这怎么能学好医学呢？最后也只能为虚度年华而嗟叹不已了。故历代医家择徒授艺，都要挑选心诚意专的人。即使是名医的子孙，也不一定都能克绍箕裘，继承家学。明代著名儿科医学家万全，共有十个儿

子，后来没有一个能继承父业的。清代名医叶天士在临死之前，曾谆谆告诫他的儿子说：“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读书万卷，而后可以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吾死，子孙慎勿轻言医。”（《清史稿·叶桂传》）这段话，概括了叶氏行医数十年的阅历和体会，是很值得医务工作者们深思的。

二、不分亲疏贵贱，全力救治

历代名家都认为医学是仁术，强调对任何病人都要关心、体贴、爱护，做到竭诚尽智，全力救治。孙思邈主张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他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千金要方·大医精诚》）凡属患者求治，当医生的应当屏弃一切私心杂念，不问病人贵贱贫富，年龄老少，容貌美丑，聪明愚蠢，也不管他属何民族，都要精诚诊治，把所有病人都当做自己的至亲好友看待。北宋医学家唐慎微，医技十分高明，“治病百不失一”，凡病家来请，“不以贵贱，有所召必往。”元代朱震亨主动去贫病之家诊治，尤其照顾“困厄无告”的病人。相反，对于那些颐指气使，盛气凌人的豪贵，不仅不予逢迎，而且敢于藐视。有一次，“权贵人以微疾来召，危坐中庭，列三品仪卫于左右。先生脉已，不言而出。或追问之，先生曰：三月后当为鬼，犹有骄气耶？”（宋濂：《丹溪先生墓志铭》）对于列三品仪卫以逞威风的权贵，朱氏不屑与之言，而对贫苦患者却热忱相待，表现了古代良医那种刚正不阿的精神。

明代医家龚廷贤主张“博施济众”，强调“贫富虽殊，药施无二。”他对当时社会那种重富轻贫的风气很不满。曾在所著《万病回春》中写道：“今世之医……每于富者用心，贫者忽略，此固医者之恒情，殆非仁术也。以余论之，医乃生死所寄，责任匪轻，岂可因贫富而我为厚薄哉！”龚氏认为，治病以贫富分厚薄，是很

不人道的，违背了医生的职守，因而予以批评。明代外科医家陈实功，对贫苦患者尤为关怀。他在所著《外科正宗》中说：“凡病家大小贫富人等，请观者便可往之，勿得迟延厌弃。”又说：“贫富之家，及游食僧道衙门差役人等，凡来看病，不可要他药钱，只当奉药。再遇贫难者，当量力微赠，方为仁术。不然有药而无火食者，命亦难保也。”陈氏悉心专攻外科四十余年，毕生治愈的人无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贫苦患者。对于个别极端贫困的病人，他不仅免费供给医药，还酌情赠送生活费。这种博施济众的精神，一直为后人所传颂。

治病贵速，一发千钧，凡病家有请，就得不顾艰险疲劳，立即出诊。孙思邈对于求治的患者，总是有求必应，做到了“勿避嶮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北宋唐慎微，应诊也是“寒暑雨雪不避”。元代朱震亨更是不惮路途远近，有请必往。“四方以疾迎候者无虚日，先生无不即往，虽雨雪载途，亦不为止。仆夫告痛，先生谕之曰：病者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耶？妾人求药无不与，不求其偿。其困厄无告者，不待其招，注药往起之，虽百里之远弗惮也。”（宋濂：《丹溪先生墓志铭》）四方有请，朱震亨随时启程，风雨无阻。其仆人为了照顾他的健康，曾代为向病家诉说辛苦疲惫，要求免予出诊。朱氏得知以后，便启发开导仆人说：病人度日如年，痛苦不堪，当医生的怎能自图安逸呢？说罢拎起药箱就出诊，甚至往返百里以上也在所不辞。

治病不分生熟亲疏，即使是有宿怨旧恨的人家，也绝不拒绝诊治。在这一方面，明代儿科医学家万全做得很突出。他不念旧恶，不计前仇，曾经千方百计地救治好一怨家小儿的危重病症。据万全在所著《幼科发挥》中记载：怨家胡元溪，有个四岁的儿子患咳嗽吐血，遍延名医，百治不愈。无可奈何，只好来求万全。万氏“以活人为心，不记宿怨”，立即前往病家诊察。经过确诊以后，便诚恳地对胡元溪说，此病“可治，吾能愈之，假一月成功”。万氏当即处方治疗，服药五剂以后，“咳减十分之七，口鼻之血止矣。”不料胡元溪嫌其子之病愈“太迟”，而且“终有疑心”，“终不释